

“南岛语族”闽台起源说的重新思考

吴春明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南岛语族”是亚太间海洋地带最重要的跨界民族,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国际语言学界的实践多局限于今南岛语族族群分布范围,忽视了华南大陆上古百越这一重要的古南岛系统文化。最近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又将“原南岛语族”文化说成是闽台沿海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大坵坑文化和富国墩类型,这与百越—南岛一体化的民族文化格局和我国大陆东南到东南亚、太平洋群岛间土著民族考古文化的统一也不相吻合。

关键词: 南岛语族 百越 闽台

中图分类号: K874 **文献标识码:** A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即“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apolynesian),是指现今广泛分布于亚洲东南至太平洋群岛等海洋地带、民族语言亲缘和文化内涵相似的土著族群。19世纪末以来,中外学者就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分子生物学等角度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0世纪后期以来,贝尔伍德、张光直等从民族考古学的角度探索“南岛语族”的扩张史,将“原南岛语族文化”指向台湾海峡沿海地带早新石器阶段的大坵坑文化和富国墩类型,在该领域的研究者中影响较大。^[1]实际上,“闽台说”还有不少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南岛语族”起源上的语言学和民族考古学观点述评

人文学者关注南岛语族问题起于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家的“殖民地研究”,德国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巴斯典(A.Bastian)在《印度尼西亚人》、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在《菲律宾的民族》等论中先后概述了以东南亚群岛为中心、分布于东西两大洋和亚澳两大洲之间的土著文化共同体特征,即“印度尼西亚文化圈”或“东南亚古文化圈”。^[2]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系统中的民族、考古、语言学者就南岛语族的文化起源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太平洋群岛说”、“东南亚群岛说”、“中南半岛说”、“华南大陆说”几大类。

福克斯(C.E.Fox)采信文化圈理论,认为在特定文化圈内,中间区域是文化的原生地带,但却是晚出文化因素的聚集地带,区域的边缘是被排挤出中心区的先驱文化聚集地。他将南岛语族文化圈定于太平洋三大群岛,认为起源地在群岛中部的密克罗尼西亚,后来因海陆变迁向外围的西、南、东面扩张迁徙。^[3]这实际上,南岛语族文化圈并不仅限于太平洋群岛,而且在该文化圈内的民族考古文化编年中,太平洋群岛文化恰是比较晚出的。

戴恩(I. Dyen)运用历史语言学方法,主张在语言亲缘的族群关系中,语言变异、复杂性程度最高的地区就是该族群的原住地,认为现南岛语族中有三个地区的语言变异、复杂性程度最高,即台湾、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岛,尤以新几内亚岛语言的总数最多,因此这里

就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实际上,语言变异的原因很多,历史语言学理论的可信度及其在南岛语族研究上适用性如何?语言学上比较语言变异的“通行的”、“基本的”词汇表是否适用于南岛语族?虽然华南地区不是现南岛语族的居留地,但华南壮侗语族和汉语闽粤方言中保留有“古南岛语的底层因素”,在南岛语族语言分类的比较研究中回避华南是否合适?脱离民族学、考古学的单纯语言学研究是否可靠?这些疑问都是戴恩理论所无法解释的。^[4]

柯恩(H.A.Kern)的方法是所谓的“语言古生物学”,他根据现代南岛语言中词汇的构成拟测南岛语族的祖语即原南岛语,看古南岛语中包含哪些环境内容,尤其是植物群和动物群的构成,从而推测南岛语族可能的发源地。柯恩的结论是原南岛语里面的动植物成分是一种热带海岸地带的环境特征,从而推定原南岛语族可能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或印度支那半岛的东岸,北不超过北回归线,南不超过爪哇,最可能是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1970年代以来,不少语言学家开展了类似的工作,结论也大致相近。^[5]柯恩的方法在语言学家中肯定的较多,但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柯恩忽视了一些地区的语言学材料,尤其是缺乏华南地区这一不可或缺的空间材料。

自193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林惠祥先后指出华南大陆的百越民族就是居留在大陆上的古代马来人,即所谓“原马来人”,并地论述了华南大陆为马来人的起源地。^[6]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林惠祥的立论还只是建立在列举共同体特征与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还无法从人群与文化的区系结构这一更为清晰的视角去梳理百越系统到马来民族文化之间的源流、过程,但他较之此前语言学主导的南岛语族研究具有了更为广阔、客观的学术视野,而且以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多学科整合而得出的结论无疑更是令人信服的。在凌纯声创建的环南中国海的“亚洲(亚澳)地中海文化圈”理论中,也阐述了东亚大陆、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之间的土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找到了半岛、群岛地带的土著文化起源于华南大陆基层文化的民族史变迁过程。^[7]

19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上开始突破语言学的主导而出现较多科际整合的趋势,而且也关注华南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张光直、格雷(G.Grace)与索尔海姆(W.G.Solheim)合作《马来—玻利尼西亚语族的迁移史: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一文,就将考古学与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华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土著居民迁徙的路线、年代,开始将华南的绳纹陶文化与南岛语族祖先联系起来。^[8]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更明确地论述南岛语族从华南的台湾到大洋洲的扩张史,即距今5000年以前从以闽台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海岸出发,5000~3000年间扩张到南海海域的东南亚群岛,3000~1000年间传播到太平洋群岛。^[9]其后,张光直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一文中,更将南岛语族最早的源头指向台湾西海岸的大坌坑文化和福建沿海的富国墩类型,他的论述对近年学术界在南岛语族上的研究有很深刻的影响。

二、“闽台说”割裂了“原南岛—百越”文化的统一性

贝尔伍德、张光直的论述先后将原南岛语族的老家指向华南,代表了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最新进展。张光直先生的中文论述在国内最有影响,他的南岛语族起源“闽台说”,实际上是通过台湾地区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材料解释贝尔伍德的南岛语族扩张史理论:在民族语言学上,台湾土著各族所操的南岛系统语言彼此差异很大,语族分群众多,表明这些南岛语言在台湾的历史比较古老;考古学上,台湾的土著文化具有长久的连续性,其中时代最早、分布广泛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因此大坌坑文化就是台湾南岛语族的祖先,也是整个原南岛语族老家的一部分;在“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有没有伸延到大陆”这一话题下,他注意到福建沿海的富国墩类型,由此推定福建、粤东沿海地区就是原南岛语族在中国东南大陆的下落。^[10]张光直先生将贝尔伍德语言学的“发现”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实际上是给考古学的研究设置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圈套”,他的“论证”只是找到了台湾南岛文化的源

头、指出了语言学家所说的最古老的南岛语族文化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并没有为语言学所谓的“台湾南岛语族文化就是整个南岛语族最古老文化”的“发现”提供考古学的佐证。

实际上,南岛语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族群文化体系,原南岛语族的考古学文化也应是一种土著文化体系,而不应作考古学文化内涵“同一”的假设。因此,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具体内涵去衡量大陆东南海岸地带的原南岛语族考古学文化,将观察点局限于福建沿海的富国墩类型,而且排除了西向两广和越南沿海、北上浙江沿海河姆渡文化同类的可能性,与至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东南土著民族之考古学文化体系的统一性格局不相吻合。

我国民族史和考古学界在东南地区史前、上古土著文化的统一性问题上是有充分认识的。^[11]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以南沿海地带、自史前到周汉间、不同于中原华夏系统的土著的百越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表现为,自江南的句吴、于越、浙闽地带的东瓯、闽越到岭南的南越、西瓯和骆越,百越各族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如果将这种统一性放在整个东亚地区上古民族文化空间分布的宏观角度考察,百越民族的地域文化特征、尤其是不同于中原华夏系统民族的文化史地位就更明确的凸现出来。而且这些共同特征几乎全部都在台湾高山族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中表现出来,不但中国东南大陆的上古百越各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其与台湾、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群岛地带的南岛语族之间也绝非两个系统的民族文化。学术文献中的“百越”与“南岛”的“差别”更多的只是中外学术论坛的隔阂,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学者“从百越看南岛”和国外学者“从南岛看百越”的视觉差距。

“百越—南岛”一体化的民族史蓝图在考古学上有充分的证据,最初的证据为更新世东南大陆至东南亚之间的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文化。我国东南地区发现的十多处人类化石遗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与华北同期人类不同的地理分域特征,而这些分域特征恰好又同样表现在东南亚群岛、大洋洲的化石人类上。如直立人阶段的和县人表现出一系列与爪哇猿人类似而不同于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早期智人阶段的马坝人也具有许多类似于爪哇岛的昂栋人而不同于华北早期智人的性状,晚期智人阶段的柳江人与加里曼丹岛尼阿人的歧异系数也明显小于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的歧异系数。^[12]在文化构成上,自中更新世晚期以来就形成的特色鲜明的砾石石器工业分布广泛、源远流长,代表了东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主流形态,成为东南土著文化本土起源、发展的最早证据。有趣的是,这个砾石石器工业同样是自中南半岛到东南亚群岛间旧石器文化的代表性特征。^[13]进入新石器、青铜器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南土著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更明确、具体地表现了出来,连接这个多元文化统一体的纽带就是印纹陶文化遗存。实际上,印纹陶文化是指广泛集中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印纹陶遗存共出为特征的、多时空的考古学文化体系,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曾将这一土著文化的谱系结构概括为“分地带、多区系而一体”的总谱系,即在“背倚华夏、面向南岛”的空间关系上的距离远近,江南湖网平原地带、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海岛地带的土著文化多元一体。^[14]以陶器群内涵的构成为例,三个地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形成了以圜底、圈足器为根本特征的土著文化传统。即便在最靠近华夏的江南湖网平原地带,罗家角、马家浜、河姆渡、仙人洞等早期阶段文化中,土著器群比较单纯,以三足、袋足器具为代表的来自中原北方文化系统的文化影响非常少,虽然在龙山、三代以后南来的文化影响加强、三足和袋足器具有递增之势,但以圜底、圈足器为代表的土著器群始终是该地带文化的主体特征,直到早期铁器时代的戚家墩类型仍是如此。在武夷山—南岭以东、以南的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地带诸时空文化中,土著器群的组合表现得更为彻底。壳丘头、前石峡等早期阶段文化是清一色的圜底器和圈足器,绝无三足、袋足器具,虽然在龙山、三代受到中原北方系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渗透和影响,但这些南来因素从未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体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所以直到周汉时代在东南两越考古学文化遗存中三足、袋足器具仍是十分稀罕的。在台湾等岛屿地带,圜底、圈足器为代表的土著文化更为封闭,虽然汉唐以来汉文化传播台湾的势头逐步加强,但影响并不深刻,新石器文化诸区系的陶器群一直是东南土

著系统，而不见中原北方的三足、袋足器，甚至在持续发展到近代的高山族各支系的原始制陶文化还只是东南系统的圜底、圈足器，与上古闽、粤地带的土著文化器群一脉相承。而且，华南大陆的这个土著考古学文化体系同样延伸到了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史前、古代文化中。在菲律宾史前考古上，卡拉那（Kalanay）、塔邦（Tabon）、诺瓦列加（Novaliches）等代表性的史前文化中，陶器的总体特征非常明显，即以圜底器为主，部分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具，器类单一，罐或釜、钵是主要的形态，器表装饰比较丰富，但以几何纹样为主。印尼群岛的新石器文化中，刻划、戳印几何纹样的圜底罐、钵也是代表性的器具。甚至在大洋洲新石器时代代表性的拉皮塔（Lapita）文化中，磨光红衣、戳印V形、齿形和几何纹带的釜、壶、盘、碗等一群陶器同样显露出上述华南陶器群浓重的土著韵味。^[15]

百越—南岛一体化的民族文化蓝图应是建立在一群具有相对稳定体质特征的土著人群存在的基础上的，体质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古人类学家在对东南百越地区先秦时期遗址中发现的人骨遗骸的综合研究发现，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增城金兰寺、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人骨的种族特征非常鲜明，即长颅、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矮小，该类型居民在先秦时期主要分布于今浙、闽、粤、桂等沿海地区，与古越人的活动空间基本吻合。这一研究确立了东亚古代人群的一个重要区域类型“古华南类型”，其前身还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广西柳江人。而且，该类型的体质特征与现代华南人群有别，与东南亚的印尼人、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等南岛语族土著人群比较接近。^[16]

因此，不论是海峡两岸的大坵坑文化、富国墩类型，还是东南地区分地带、多区系的史前、上古土著文化，以及东南亚、大洋洲的南岛语族史前文化，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文化体系。张光直先生在寻找南岛语族的考古文化源头时，以东南文化体系的一个环节即大坵坑文化的具体特征去衡量大陆东南的史前文化，而只看到福建、粤东沿海的富国墩类型与之同类，不符合东南土著文化的统一性格局。“原南岛语族”与史前、上古华南土著文化应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三、“闽台说”割裂了东南土著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对于大坵坑文化、富国墩类型之后的两岸考古学文化，张光直先生在“闽台说”中给予了完全不同的定性，“富国墩文化与昙石山文化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龙山形成期的文化影响很有力的波动到东南海岸，这个文化与汉藏语族可能是关系密切的。海峡西岸的富国墩、大坵坑被新的文化所取代，这种新的文化为考古学上的昙石山文化所代表。”^[17]将富国墩类型与其后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昙石山文化割裂开来，将其差别看成“原南岛语族”到“汉藏语族”的质变，同样与东南海岸地带史前、上古民族史、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连续过程与土著性质不相吻合。

前述我国东南、东南亚地区的土著原始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以砾石石器工业为特征，而且在更、全新世之交的华南洞穴砾石石器文化中首次出现穿孔、磨刃等新石器时代工艺，表明土著文化从源头向下的延续、发展。^[18]在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上，虽然在龙山、夏商等个别时代受到来自中原北方系统文化的强势影响，尤其是在靠近北方的江南湖网平原盆地地带，除了土著文化内涵外还不同程度地共出复杂的北方、华夏系统的文化因素，但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印纹陶文化和特征显著的圜底器、圈足器、缺乏三足器和袋类器的陶器群为代表的土著文化主导地位是延续不断的。土著文化的主导地位在周汉以后才因楚汉文化的先后南下而逐步丧失，在夏商帝国时代没有、在龙山时代更没有华夏、汉藏语族文化在东南地区主导局面的出现。

土著文化的延续性在武夷山—南岭山地以东、以南一侧的粤闽地带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在闽江下游地区史前、先秦两汉古文化的发展进程上，土著文化顽强延续、而且阶段性地

滞后于北方和内地的早期古文化发展水平。具体讲,在距今约 6000~3000 年间,约相当于中原文化编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闽江流域原始文化始终停留在新石器文化持续发展的水平,在壳丘头文化—昙石山下层文化—昙石山文化—昙石山上层文化—黄土仑文化的发展序列上,文化内涵、尤其是陶器群的陶系、装饰纹样、器物组合、典型器物形态等的演变都一脉相承、延续发展,几乎没有缺环。影响这一文化序列之土著“纯度”的有昙石山文化中鼎等个别龙山时代特征的因素、昙石山上层和黄土仑文化中个别夏商青铜文化因素,前者正是张光直先生将昙石山文化断为“龙山形成期”的“汉藏语族”文化的依据。实际上,昙石山文化的主体是以宽沿圜底釜、直颈圜底罐、壶、圈足罐、豆等为代表的土著器物群,它们是从壳丘头文化直接继承下来的,而且在其后的昙石山上层、黄土仑文化中再次显现,鼎等个别因素数量很有限,而且是在土著的宽沿圜底釜基础上加三柱足而成的,只是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不是移植。更重要的是,昙石山文化中龙山因素的影响只是短暂的,在其后续的昙石山上层、黄土仑文化中没有留下痕迹。在距今 3000~2000 年间,约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两周秦汉间,东南地区百越文化系统内部出现了较深刻的文化整合,闽江流域的铁山类型青铜文化、富林岗—风林山类型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就是土著文化与吴越青铜文化融合形成的土著文化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北方华夏系统的文化影响确有增长,但土著文化主流传统的延续也是明确的,铁山、富林岗、风林山文化陶器群仍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圜底器、圈足器为代表的土著传统,代表性器物形态的上承下传特征也很明显,以至于秦汉时代以富林岗—风林山文化为代表的闽越考古学文化内涵与中原北方秦汉文化系统截然不同。迄今为止,代表这一地区华夏、汉文化直接移植的最早的考古学证据是闽侯庄边山楚汉文化墓地,它才是闽中地区最早的“汉藏语族”考古学文化遗存,但该文化也没有取代富林岗—风林山类型土著文化而成为秦汉时期闽江流域文化主体。六朝以后,闽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与面貌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土著内涵的主流地位不复存在,土著文化向所谓“汉藏语族”文化的更迭最终出现。^[19]

在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陶器的基本组合也为圜底的釜、罐、钵、圈足的盘、豆及器座等,目前也仅在三水银洲一期龙山时代文化中发现一件性质类似于昙石山中层中的鼎。北江山新石器文化陶器组合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土著特征一致,只是在石峡文化阶段形势有所变化,该文化因地理位置靠近内地而共出一批三足、袋足器群,与北方龙山文化的影响有关,不少学者强调了这批外来因素在岭南史前、上古史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忽视了石峡文化中以圜底釜、罐及圈足盘、豆类器为代表的土著器群在原始文化延续发展序列中的主干地位。正是由于这些被忽视的土著文化因素群的主导作用,石峡文化中的龙山因素影响范围主要局限北江峡谷,对后续文化也没有什么深刻影响,在该地区晚于石峡文化的石峡中层类型及更晚的青铜时代夔纹陶文化中,几乎不见了那些中原北方华夏系统的三足、袋足器具。^[20]因此严文明先生指出,石峡文化“不能看成广东青铜文化的主要基础”。^[21]土著文化通过青铜时代的发展,延续到秦汉时代的南越考古学文化中,所以广州汉墓中圜底、平底、圈足的米纹陶器群在西汉前期仍是主流。

因此,在中国东南沿海民族考古资料中,昙石山、石峡等龙山时代文化在本质上还是土著的原百越—南岛系统文化,从龙山时代到“汉藏语族”文化在东南的出现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在民族史学上,研究者对于东南百越系统文化的发展过程虽有不同的认识,但都主张百越系统各族群文化分别起源于东南本土的原始文化,在整个史前、上古时期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土著族群而活跃于东南各地,只是周汉以后在楚、汉帝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统一进程中相继融入中原北方南下的华夏、汉文化,少量百越后裔大分散、小聚居于东南汉民人群之中而为畬、瑶、黎、壮等少数民族。^[22]就是说,将东南土著民族(即百越—南岛系)的终结和汉藏语族的开端,说成是史前时代业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不符合东南土著民族延续性的客观事实。

参考文献

- [1][9][10][17]Peter Bellwood,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C], 1983(4);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A].南方民族考古.1-14.(1)[C].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J]1989(6).541-550.
- [2][7]凌纯声.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A].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C], 台北: 台湾联经图书 1979 年.
- [3] 李壬癸.台湾原住民的族群与迁徙[M].台北: 常民文化,1997.20-21.
- [4] 同[3].34-40.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厦门大学学报[J].2002(2).54-62.
- [5]同[3].23-34.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A].南方民族考古(1)[C].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6] 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4-333.
- [8] Kwang-chih Chang, George W. Grace, Wilhelm G. Solheim II. Movement of the Malayo-Polynsians: !500B.C.to A.D.500[J], Current Anthropology.1964(5).359-406.
- [11][20]陈国强, 蒋炳钊, 吴绵吉, 辛土成.百越民族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蒋炳钊, 吴绵吉, 辛土成.百越民族文化[M].北京: 学林出版社,1988.
- [12] 吴汝康..中国远古人类[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9.吴新智.中国晚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其南邻(尼阿人和塔邦人)的关系[J].人类学学报.1987(3).180-183.
- [13]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M].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41-60.
- [14]同[13] 63-81.
- [15] 吴春明.菲律宾史前文化中的大陆因素[A], 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 2002 年年会论文[C].绍兴.2002(6).Patrick V. Kirch. Advances in Polynesian Prehistory: Three Decades in Review[J],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1982(1).
- [16] 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 吉林大学学报[J].2002(3).5-12.
- [18] 吴春明.试析华南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A].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C],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19] 吴春明.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95(2).147-172.
- [21] 严文明.珠海考古散记.[A].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C],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22] 同[11]3-14.[13]313-324.

A Deliberation on that Austronesian Originated in Fujian and Taiwan

WU Chun-m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Austronesia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maritime ethnic groups widely spread throughout southern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s. The traditional investigation of Proto-Austronesian homeland was focused on the ethnolinguistic population presently living in islands between Asian and Pacific. They ignored the ancient Yue Nationalities of Southern China which is most important proto-Austronesian. The ethno-archaeological discipline supports that the early stage of Neolithic Tapenkeng-Fuguodun culture of Fujian and Taiwan is the only source of the origins and dispersal of Austronesian. This model completely cut off the integration of paleo-aboriginals community between south mainland China and Pacific islands.

Keywords: Austronesian, Yue Nationalities of Southern China, Fujian and Taiwan.

收稿日期: 2002—08—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民族学 01BMZ023)。

作者简介: 吴春明 (1966—), 男, 福建省古田县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民族考古学与海洋考古学。